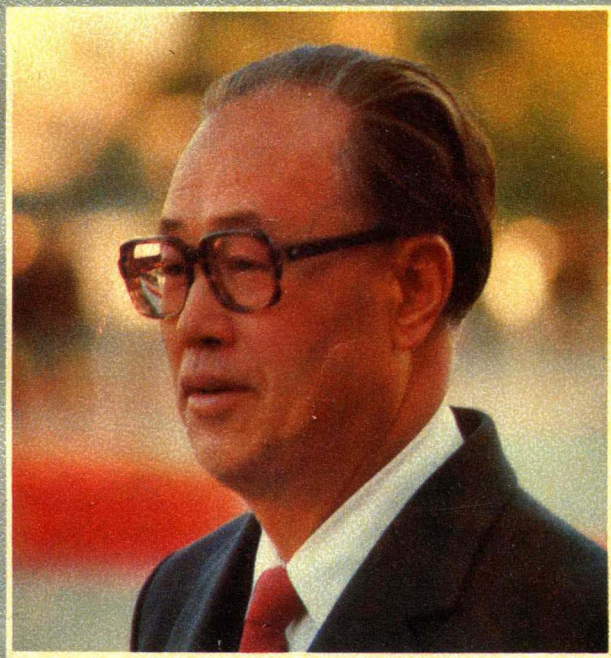


# 赵紫阳

——从地方干部到总理

● [美] 戴维·桑鲍 著

● 陈玮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赵紫阳

——从地方干部到总理

● [美]戴维·桑鲍 著

● 陈玮 译

赵紫阳

——从地方干部到总理

[美]戴维·桑鲍 著

陈 玮 译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昌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本 5印张 70千字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山东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ISBN 7—5043—0132—9/D·19

定价:2.60元

## 引 言

本书为政治传记。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追溯赵紫阳的发展历程，从其出生写到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因此，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赵紫阳在地方工作经历的编年记述。其次，作者力求从中国政治体制的上层人事变动的广阔背景上描述赵紫阳的政治生涯。

我认为，作为省级精英的赵紫阳，他同中央的关系乃是影响他的政治前途的决定性因素。赵紫阳同中央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表现为他同他的省、大区及中央的上级的关系。有些研究论著强调私人关系及老上级——老部下关系网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决不是中国所独有。其次表现为赵紫阳对中央各项政策的反应。我赞成政策争论即是派别活动的集结点和考验忠诚的手段的观点，我以为不能低估政策争论是政策过程中的自主变量的重大意义，它本身就能支配人们的

注意力。政策争论不是抽象的信条，而是政治过程的核心。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围绕着政策争论而纵横捭阖，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促进于己有利的政策。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

因此，本书的相当一部分篇幅专门论述赵紫阳对各种政策争论所公开表明立场。通过考察赵紫阳对某一具体政策争论说些什么，我们可以最充分地利用公开记载揭示他的观点如何随着时势的推移而发展。了解赵紫阳对某一有争议问题的想法可以揭示他本人的政治哲学。了解赵紫阳如何动员力量支持或反对某项政策有助于表明他的政治能力。了解赵紫阳如何贯彻执行政策可以大体上认识他的政治工作作风。因此，尽管手头资料有限，我还是尽可能把赵紫阳的公开讲话同中央政策作对比，并试图确定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他在中央与地方间的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在阅读拙著时还必须注意，离开更大范围的中央——地方背景是不可能全面理解赵紫阳的发展历程的。鉴于赵紫阳所担任的省级职务使他处于政策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地位，所以，只有看到他所承受的来自上面和来自下面的压力，才能理解他的行为。

读者还须理解，研究本专题的资料十分有限。本专题所涉及的时期，中国对于外国人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基本上实行保密。由于没有机会采访赵紫阳本人

及其亲密同事，只好借助于“北京学”分析所使用的一般性资料，即：

各类传记辞典：

公开行踪资料（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所编纂的人物传记卡档案和美国外事估计中心关于中国领导人行踪的资料）：

中央和地方报刊：

官方统计资料：

第二手资料。

以上列举的资料，作者在研究时都使用上了，我相信本书反映了外国人到目前為止所知悉的有关赵紫阳经历的全部材料。不过我认为本书的记述是不完全的。读者将会发现，有关赵紫阳公共露面的记录总是有间断，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以及在此期间他在干什么。因此，读者必须理解，赵紫阳的频频“不露面”就是对他公开露面的报道的间断。

关于本书的写法和资料问题，谨说明如上。下面就请读者看一下赵紫阳如何从党的地方干部一跃而为中国政府的总理。

# 目 录

引 言	( 1 )
第一章 一九五三年以前	
广东工作实践锻炼	
扩大政策知识领域	( 1 )
第二章 经历各种运动	
政治更加成熟	
1954—1960 年	( 6 )
第三章 抓经济,搞运动	
取得领导职位	
1961—1965 年	( 28 )
第四章 失去权力:文化大革命	
1966—1968 年	( 42 )
第五章 恢复工作,重返广东	
1971—1975 年	( 55 )
第六章 “四川经验”:建国蓝图	
1976—1979 年	( 62 )
第七章 赵紫阳的腾飞	
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动	( 103 )

# 第一章

## 一九五三年以前

### 广东工作实践锻炼

### 扩大政策知识领域

赵紫阳 1919 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父亲务农，兼营粮栈。1928——1937 年，先后就读于滑县第一完小，开封第一初级中学和武汉高级中学。1932 年 3 月加入共青团，1938 年 2 月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他在家乡滑县入党，但入党介绍人是谁，不得而知。后来可能上过党校，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出国留学。

1938——1940 年，在家乡滑县任中共县委书记。在日本人入侵时期，这个县成为冀鲁豫边区第三专区的一部分。在 1946 年以前，他一直在该区工作，先后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参加了 1945——1946 年的土改），中共第三地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这样，在他参加工作的初



期就接触了党务工作的三个重要领域：农业、宣传和人事。曾在这个边区工作过、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且赵紫阳可能与之有接触的有：安子文、黄镇、李雪峰、刘伯承、薄一波、苏振华、宋任穷、王任重和杨得志。1946年，赵紫阳调到鄂皖根据地（也称第四后方根据地）的桐柏山区，仍先后任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受该区四方面军司令员李先念的领导。赵紫阳可能与之有接触的四方面军其他重要成员有：许世友、徐向前、陈锡联和廖承志。1948年调豫西南，任中共桐柏县委副书记，后来任中共南阳地委第一书记，直到1951年。

赵紫阳调到广东省工作的确切日期不清楚。他以华南分局土改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首次在那里露面是1951年5月，这意味着他是随同一大批南下干部于4月到达广东的。

赵紫阳作为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专门负责对土改工作队的检查督促，并曾多次亲自参加了粤中和粤北地区斗地主的斗争会。

1951年8月，赵紫阳被提拔为华南分局书记处秘书长，随后为华南分局常务委员。作为秘书长，赵紫阳负责全省日常事务的联络。秘书长是向下级机关传达上级机关文件的重要渠道，负责向第一书记提供这些文件的书面摘要，并主管第一书记讲话稿和报告稿的起草工作。因此，作为情报信息的管理者，赵紫阳掌握着中国政治体

制中的权力工具之一。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条块分割、高度集中的制度，中央的指示垂直下达，地方直接向中央报告工作，因此，赵紫阳完全能够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督，并按他和别人的观点解释上级指示。

赵紫阳被提拔担任这一职务前后，有人认为他与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有联系，这种推测不无道理。杜润生象赵紫阳一样是位农业问题专家，并兼任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李雪峰）。1954年，杜润生上调北京，继续在农业口任职。赵紫阳和杜润生在他们政治生涯的早期就有联系，今天，他们仍继续在一起共事。1982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兼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赵紫阳任命杜润生为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

赵紫阳以华南分局书记处秘书长的身份在根据中南局的紧急指示于1951年8月6—20日举行的广东省扩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重要讲话。赵紫阳在讲话中号召下级干部对一切阻挠土改的上级干部提出严肃的批评。

在这批新来的干部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陶铸。他后来成为华南最有影响的人物，并且在以后的十五年里一直是赵紫阳的顶头上司。陶铸是1952年1月末或2月初从武汉调来的，在这之前，他是中南局的一名重要官员。他的第一批任务之一是对土改的现状进行调查，任命赵紫阳分管视察团。这是他们密切的工作关系的开

始。

1953年9月，赵紫阳出任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同时仍保留其华南分局书记处秘书长的职务。作为农村工作部长，赵紫阳的副手是安平生，此人后来成为西南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的重要人物。作为秘书长，赵紫阳还和杨易辰、区梦觉（华南分局组织部正副部长）一起抓迅速大批地发展新党员的工作。1949至1954年底，广东省的党员人数从40000人发展为200000人，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都在大力发展新党员。在此期间，由于需要大批的行政干部，再加上征募新兵和各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批积极分子，党的队伍壮大了。

总起来说，赵紫阳在广东的头三年是确立他的政治和职业信誉的三年。在此期间，赵紫阳扩大了他的政策知识的领域。也象在鄂皖根据地时那样，赵紫阳分管人事管理——中国政治权力的关键部门之一。他不仅继续抓干部的整风和吸收新干部，而且据一位提供消息的人士说，他还曾在广东省党校给干部们讲课，讲发动群众的方法。他在农业方面的工作也通过他所担任的实施土改的重要职务而得以继续。最后，他通过他在分局文件传达和文件起草过程中的承上启下作用扩大了自身的政治基础。他在农业（土改）、人事管理和情报管理（文件流通），这三个领域所做的出色工作，博得了武汉中南局的器重。赵紫阳和陶铸以及广东省委的其它成员一道工作

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至于他同武汉中南局李先念、王任重等官员的联系如何，无法找到文件证实。另外，也找不到证据说明他在这一时期同邓小平、邓子恢、陈云有任何联系，更不必说象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这样的最高领导人了。

## 第二章

### 经历各种运动

### 政治更加成熟

1954—1960年

从1953年土改结束到1960年大跃进结束，是经济上大起大落的七年，并以大跃进的夭折而告终。在此期间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接连不断。在这一段时间内，赵紫阳本人的政策趣向表现得明显起来，而在政治上也变得精明了。他的职务不断增加，肩负的责任也日益沉重。下面就介绍他在这七年中的任职情况。

在1955年以前，赵紫阳一直任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长，但在1954年陆续兼任其他职务后，不再兼任华南分局书记处秘书长。1954年7月，赵紫阳作为粤中地区的代表出席第一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中共政权为加强地方行政管理而采取的全国性措施的组成部分）。

1954年10月，任华南分局书记处第三书记，直到1955年7月华南分局被撤销时为止。1954年11月，兼任广东省粮食征购指挥部总指挥。1955年2月，当选为广东省人大主席团成员。自1955年7月起至1956年1月止，任广东省委书记处副书记。1955年8月，兼任亚热带资源开发委员会主任，负责抓海南岛和广东其他地区的资源开发。1956年只有一项新的兼职；兼任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1957年4月，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处秘书长，重新获得了他在华南分局所担任过的职务。1957年11月，兼任广东省军区党委书记。1958—1961年间，赵紫阳未增加任何新职务。

作为农村工作部长，赵紫阳负责向农村地区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指导政府的农林、水利、农垦、兽医各部门的活动。不用说，这都不是小任务，从抓运动到指挥大规模的水利农垦项目，一切都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作为省粮食征购局负责人，他的任务是检查产量、摊派交售额和公粮额，保证统销分配，这都是些敏感而棘手的问题。

作为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他的主要任务是管理他所分管的领域——农业，并向第一书记（陶铸）汇报这个领域的一切有关情况。他负责对一切同农业有关的文件作“批示”保证有关指示的正确贯彻，为第一书记起草讲话和报告，以及一般属于他处理的事项。因此，在高级领导

人和外宾经过广东时，他常和陶铸一起或代表陶铸去迎送。例如1954年6月30日他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这是报刊报道的他们二人的首次会见）。在这一段时间内他还接待过波兰、日共、东德、北越、锡共和缅甸等地来的外宾。

作为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赵紫阳主要负责抓全省军队的思想教育（即宣传党的现行政策），因此，他同1954年改组后的解放军三大总部之一的总政治部有密切的工作联系。

最后，作为广东省委书记处副书记和后来的秘书长，赵紫阳处于全省政治权力的中枢。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有多种权力源泉，消息是其中之一，而情报由消息组成。书记处是党内情报和文件传输系统的神经中枢。作为副书记，赵紫阳负责一切和他分管的农业有关的文件，但作为秘书长，他的职权范围包括全部五大职能系统：农村工作、政法、宣教、工交和财贸。这一职务所具有的权力不可低估。陶铸主要依靠赵紫阳向他提供的情报。赵紫阳负责中央指示即中发文件的接收、解释（按其精神或字面）和传播。如果某一文件需要重新草拟，他也须负责配合。此外，他还负责组织会议材料，起草主要干部在省的工作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其实就是会议的议程），这种工作会议审议确定政策选择，然后呈报上级机关作形式上的通过。他也负责抓对陶铸重要报告和讲话的起草

工作。作为书记处秘书长，赵紫阳的中央顶头上司正是邓小平。这是他显然有机会接触的最早的实例，不过，有关他们之间接触的具体证据却找不到。从领导制度的指挥环节看，有理由认为他们在一起共事过。最后一点，赵紫阳的秘书长职责也包括担任省委主办的双月刊《上游》的总编辑。在一个新闻受控制、报刊电台主要是宣传和传达政策的工具的社会里，赵紫阳在这一领域的潜在影响是相当大的。总之，赵紫阳虽然不是广东省的最高长官，但如从他所控制和接近的政治权力杠杆看，他也许是全省最有影响的人物。

从1954——1960年赵紫阳行踪资料的主要动向看，他的时间主要用于同农业有关的政策问题。因此，下文集中论述这一时期的广东农业发展情况，并试图描述赵紫阳本人在这方面的有关情况。

在赵紫阳担任农村工作部长的第一年即1953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宣布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它的含义是，农民除了（按1950年所规定的办法）交公粮外，还需完成商品粮指标，把粮食按规定的低价卖给国家。国家则按固定的低价把粮食卖给吃国库粮的人口。广东省因土改迟缓和不断闹地方主义，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际施行比全国各地晚六个月。到1954年开始实行这一政策时，解释和贯彻政策的重担就落在赵紫阳及其农村工作部身上了。



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人们阳奉阴违，隐藏粮食的事情频频发生。究其原因，有如下几方面：首先，一些富裕农民根本就不愿意按无利可图的规定低价把大批粮食卖给国家；其次，在经历了严厉的土改之后，不少人唯恐共产党侵入他们的生活；再次，1953年广东全省粮食产量不高，仍然是一个需要进口粮食缺粮省。从1952年到1953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从189亿斤下降到178亿斤，减少了11亿斤。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赵紫阳受命担任1954年11月新成立的粮食征购局总指挥。这虽然是个很敏感的职务，但他马上就作出了成绩。1954年粮食总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而达到210亿斤。广东因春季粮食收成欠佳受到中央的批评，因而对秋季收成格外下力气抓。通常，每年的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百分之六十靠秋季收成，而1954年的秋季作物却完成了全年国家征购指标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引起了大批囤积粮食，隐瞒低报1955年春熟作物产量，不种商品作物。结果，1955年春熟作物产量下降百分之十。

针对这一情况，政府开展了“三定运动”。这一运动是对上述“统购统销”政策（即“三定”中的两项）的修正，通过把指标同产量相联系（第三项“定”）以缓解农民对指标的抵制。也就是说，农民不是按规定数量（根据农民的土地、农具和牲畜相应确定），而是按其产量的规定比例